

35

野蛮横行的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

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曾这样写到：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，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，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。溥仪的这个比喻真是再准确不过了。

吉冈安直，日本鹿儿岛人，日本陆军学校和陆大毕业。从1935年起被关东军派到溥仪身边，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溥仪。吉冈安直有双重身份，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，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“满洲国帝室御用挂”。“帝室御用挂”是日本名称，御用是“事情”的敬语，指皇帝的事情，“挂”是从事办理的意思。帝室御用挂就是从事办理帝室和皇帝的事情。按中国话可说成是“内廷行走”或是“皇家秘书”。究竟应该译成什么合适，其实都不能完全体现出他的地位。那么，吉冈安直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他和溥仪又是什么关系呢？

1935年，溥仪充当傀儡皇帝之后，关东军为了加强对溥仪的控制，决定在溥仪身边安插一个监视控制的特务。经过吉冈的多方努力和关东军的挑选，把正在任教的吉



吉冈安直

冈选中。

溥仪在天津时，吉冈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，常给溥仪进讲时事。溥仪做了伪满皇帝后，吉冈朝思梦想，千方百计要到溥仪身边做官，以图飞黄腾达。那时，吉冈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官，溥仪的弟弟溥杰是该校的学生。吉冈为了达到目的，几乎每个周日都要请溥杰到他家做客，殷勤招待。因此吉冈和溥仪的弟弟溥杰成了非常“要好”的朋友。

有一天，吉冈向溥杰透露：关东军有意请他到满洲担任军方与溥仪的联络人，请溥杰转达他愿意为皇上效忠的诚意。溥仪收到溥杰的信后，认为有个熟人作联络人总比生人办事方便些，便回信给溥杰表示欢迎吉冈之意。吉冈听到后感到不胜荣幸。但是对于吉冈来说，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做官，而要做官如果不披上关东军这张虎皮就很难达到目的。于是他表示，如果不能兼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话他就不想干了。后经他多方活动，果然如愿以偿，当上了关东军高级参谋和伪满洲国的帝室御用挂。

吉冈到任后，对溥仪真可谓是尽心尽力。他按照关东军的旨意，对溥仪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要进行严格的限制。他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特殊的，是溥仪与关东军之间的一个传感器。他们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，即相互联系，又各具特点。因为三者各有各的目的。溥仪的目的是希望复辟，是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恢复大清，可万没想到却成了侵略者的傀儡。他虽然有思想活动，不甘心长期作傀儡，但他又不敢反抗，梦想和侵略者和平相处，以求在长久的生存中达到复辟的目的。关东军作为伪满洲国的主宰者，表面上把伪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家的样子，实际上只能让伪满洲国尽其殖民地的义务，只能允许溥仪活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。表面上给溥仪一定的优厚待遇，其最终目的是让他听话，从宗教、思想、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，使其成为一个驯服的工具。而吉冈则是想借助这个平台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。

吉冈安直到任后，为了驯服溥仪，可谓是殚精竭虑，夜以继日，观察溥仪的喜怒哀乐，尽量不让溥仪有什么烦恼。对溥仪毕恭毕敬，察颜观色，照顾备致，考虑周到，使其死心塌地的作一个傀儡。通过他顺利地把关东军的意图传达给溥仪。溥仪在14年的傀儡皇帝生涯中，能够获得日本天皇和皇太后的欢心，博得关东军的满意，这都与吉冈的惨淡经营、精心控制分不开。正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所说：“我出巡、接见宾客、行礼、训示臣民、举杯祝酒，以至点头微笑，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。我能见什么人、见了说什么

话，以及我出席什么会，会上讲什么等，一概听他的吩咐。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字写在纸条上的”。这里举几个例子：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作为日本侵略者附属地的伪满洲国当然要首当其冲，支持侵略战争。为了全面动员伪满洲国出粮、出人、出物资，由伪满国务院主持召开“省长会议”。会上，按照吉冈纸条上的“训勉”，溥仪命令张景惠在会上要求全国各省要“勤劳奉仕，支持圣战”。

1940年，恰逢日本纪元2600年，日本关东军决定派溥仪东渡日本，迎接日本的祖宗天照大神到伪满洲国供奉，目的是为了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东北人民。按照关东军的旨意，吉冈来到溥仪身边，向溥仪解释说：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，每代天皇都是“现人神”，即大神的化身，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，死后即成神。“日满精神如一体，信仰应该相同”。于是溥仪按关东军的要求，于1940年5月，第二次东渡日本。在溥仪会见裕仁天皇的时候，拿出吉冈事先为他写好的台词，照着念了一遍。大意是：为了体现“日满一德一心、不可分割”的关系，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，到“满洲国”奉祀。裕仁天皇淡淡地答到：“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，我只好从命！”接着裕仁天皇站起来，把桌上早已准备好的三件东西，即一把剑、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，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交给了溥仪。就这样溥仪带着日本人的祖宗回到长春，并在伪满皇宫的东南角修建了专门用于供奉天照大神的“建国神庙”。按照关东军的规定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由溥仪带头，连同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洲国的官员们，都要前去祭祀。同时，在东北各地也修建了大小不同的“神庙”，要求按时祭祀，规定：无论何人走过神庙，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，否则就要按照不敬罪处罚法加以惩罚。天照大神的到来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耻辱与灾难。

吉冈对溥仪的控制可谓是无孔不入。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不断深入，日本在关内每攻占一个较大的城市，吉冈必在报告了战果之后，都要让溥仪随他一同站立，朝战场方向鞠躬，为战死的日军官兵默哀。经过吉冈的反复训练，到武汉陷落时，溥仪就不再用他提醒了，当他报告完战况后，溥仪就自动起立，鞠躬默哀。

随着侵略战争的升级，吉冈对溥仪的要求也不断升级，也就是这次武汉陷落后，吉冈指示溥仪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写亲笔祝词，颂扬他的所

谓战功。并指示溥仪给日本天皇去贺电。

这还不算，就连溥仪的亲属来看望溥仪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，规定除了溥仪的近支亲属之外，其余的人只能向溥仪行礼，不准与溥仪交谈。对于外面寄给溥仪的信件，也一律要由吉冈决定是否给溥仪看。

随着日本关东军在前线的节节败退，关东军和吉冈在溥仪面前的辈分则越来越高。在吉冈的心中，关东军就是溥仪的衣食父母，他公然对溥仪说：“关东军是你的父亲，我就是关东军的代表”。

吉冈在宫中的办公室就设在伪满皇宫勤民楼一楼，他可以随时出入溥仪的寝宫，时刻监视着溥仪的一切活动。伪满末期，为了加强对溥仪的控制，吉冈的进宫次数不断增加，频频出入，有时到皇宫不到十分钟就走，走了不到五分钟又回来了。而来去的理由十分牵强，其目的十分明显，就是以突然袭击的办法来监视溥仪的一举一动。溥仪为了不使吉冈疑心，只要一听到吉冈来了，就立即接见。甚至正在吃饭，也要立刻放下碗筷去见吉冈。正如溥仪自己所说：“对于他，我也真算做到了‘一饭三吐哺，一沐三握发’的程度。”

吉冈对溥仪也算是“忠心”可嘉，就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，吉冈也没有忘记溥仪，还企图保护溥仪到日本避难，直到被苏军劫走，吉冈仍守在溥仪身边，可谓是尽职尽责。不过对于此时的溥仪来说，可是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他，请求苏联红军帮忙，才把这条跟随他近十年的尾巴切掉了。吉冈被押往苏联后，关押在莫斯科郊外的俘虏营里，1949年1月，病死在那里。